

[文章编号] 1003—4684(2020)03-0010-05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方案

——重读孙中山《实业计划》

常恒越，韩 东

(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8)

[摘 要] 孙中山期望通过《实业计划》的实施能够加速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方案。从《实业计划》中可以提炼出孙中山关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四条基本原则：坚持对外开放，共享共赢；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和平崛起。这四条基本原则在今天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同时事实也证明：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上述原则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有效贯彻。

[关键词] 共享；国有资本；人民；和平

[中国分类号] F420 **[文献标识码]** A

2019 年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发表 100 周年纪念。重读《实业计划》，孙中山在文中孜孜以求的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能够超越垄断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加速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换言之，孙中山试图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一套中国方案。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究竟提出了怎样的中国方案，而这些思想在今天的中国又是否得到了继承，这些便是文中所要探讨的问题。

1 坚持对外开放，共享共赢

与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前的闭关锁国相比，整部《实业计划》最为根本的一点就是强调对外开放，期望打造在经济发展上共享共赢的新格局。孙中山完全是把中国的工业发展和民族振兴之道置于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下来考量，他说：“然则中国富源之发展，已成为今日世界人类之至大问题，不独为中国之利害而已也。”^[1]在他看来，中国的工业振兴需要世界，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的工业振兴。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一方面始终认为中国的工业发展滞后于欧美发达国家，若想奋起直追就必须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并且利用其资本、机器以及专业人才资源。他强调：“欧美二洲之工业发达，早于中国百年，今欲于甚短时期内追及之，须用其资本、用其机器。若外国资本不可得，至少亦须用其专门家、发明家，以为吾国制造机器。”^{[1]239} 另一方面，孙中山

基于对一战之后各参战国产业转型趋势的判断，认为各发达国家若想恢复到战前的经济状况就必须依靠中国的工业振兴。一战结束意味着前线军人陆续返回后方重回产业工人大军以及军事工业向民用转型，这就决定了战后各发达国家的产能会出现大幅增长。在此背景下要想保持资本再生产的正常运转，必须寻找具有包容性的新兴市场。在孙中山看来，只要能够实现工业振兴，“则中国不特为各国余货消纳之地，实课为吸收经济之汪洋大海，凡诸工业国其资本有余者，中国能尽数吸收之。”^{[1]XV} 最终，孙中山通过实业计划期待推动建立共享共赢的全球经济格局。他说：若发达国家开动自己的工业系统驱动中国发展，并形成“中外利益均沾”的格局，那么“中国人民必欢迎之。”为了打消西方国家对于实行计划可能会“引起外国工业之竞争”的担忧，孙中山特意强调，实业计划的施行最终“可使中国开一新市场，既以销其自产之货，又能销外国所产，两不相妨。”^{[1]XI}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2]这可以说是对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一条基本经验。08 金融风暴虽然已历 10 年有余，但西方国家经济恢复缓慢让极右势力、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极端政治派别或政治人物有机会登上舞台，掀起了一场“反全球化”的浪潮。在这场浪潮中，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无疑是反全球化的急先锋，“美国优先”的策略对现有的全球经济体系造成了极大的

[收稿日期] 2019—10—17

[第一作者] 常恒越(1995—)，男，山西临汾人，湖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通信作者] 韩 东(1981—)，男，湖北武汉人，法学博士，湖北工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冲击。这让人不禁联想到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将贸易战争视为“将来战争之最大原因”的观点,而彼时的美国是孙中山心目中以自身发达的工商业令世界“大受其益”的楷模。在美国引领“反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作为全球经济体系中举足轻重的新兴力量——中国的态度就变得至关重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并呼吁世界各国“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2]59} 2018年11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办。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旨演讲,再次向世界承诺中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从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今天的中国已经实现了孙中山在一个世纪前的设想,西方各国如想使经济恢复到08金融风暴之前的状况离不开中国这个“活力大市场”,而中国能够成为“活力大市场”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

2 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与国有企业

对自己所拟定的国际发展中国实业计划,孙中山认为其本质就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即“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为相用。”^{[1]283} 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的实业发展应当两条腿走路,其一是依靠“个人企业”,其二是依靠“国家经营”。使两条腿步调和谐的原则并不复杂:能由个人企业胜任的事业就无需国家插手,而个人企业无法胜任的事业则应有国家经营。在此基础上,孙中山认为《实业计划》中所包含的事业均被认为属于“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的范畴^{[1]3}。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激烈的市场竞争必然造成企业规模的膨胀以至于出现像标准石油那样的垄断寡头型大公司。孙中山认为垄断型大公司在效率方面有着小企业无可比拟的优势,“能节省浪费,能产出最廉价物品”^{[1]281};但拥有如此巨大经济影响力的经济组织若为私人所有则有操纵市场以危害社会的风险,后者也是垄断型大公司在现实中遭遇各种非议的关键。孙中山提出,只要将大公司收归国有就可以两全其美,既可以保留效率优势,又可以将其置于民主政府的控制下以追求社会公益为行动准则。在他的设想

中,实业计划应当是在国际资本的帮助下,以“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的方式来实现^{[1]281}。这样的策略在后来的《三民主义》中被归纳为“制造国家资本”。孙中山认为,作为工业时代的资本——机器设备应“为国家所有”、“由国家经营”。^{[1]190}在他看来,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短暂实行政府管制的经济政策就是自己所谓“制造国家资本”的体现。总之,孙中山坚信中国的实业必须要依靠“制造国家资本”的方式才能得到发展。

与《实业计划》的设想相仿,中国在现实中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所仰仗的也是公有制经济、国有企业。此外,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层面同样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另一方面“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且在公有制经济主导国计民生的条件下成功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21}。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部分提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2]33}有学者认为,以上表述标志着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逐渐开始由“国家管企业”向“国家管资本”转变。因为“在实践中,没有永远的企业。企业在经营中被淘汰、被颠覆是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常态,犹如新细胞替代旧细胞一样。”^[3]因此要想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就必须不断对国有资本的运转进行动态调整,“从回报率低的、弱势的、没有潜力的领域,调整到回报率高的、有潜力的领域。”^[3]但是,这并不是说可以就此抛弃国有企业。宋方敏就认为,“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是国资国企改革有机联系的两个层面的目标要求:“‘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是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基础,‘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这一基础在宏观层面的体现。……没有国有企业这个基础,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有资本;没有国有企业的‘做强做优做大’,就不可能有国有资本的‘做强做优做大’。”^[4]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所谓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就是公司制。由此可见,今天的中国正在将孙中山一个世纪以前关于“国家管理资本,发达资本”的设想转变为现实,但孙中山的理想之所以能够转变为现实依仗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孙中山在拟定《实业计划》的过程中极为注重民意和民生。所谓注重民意就是指《实业计划》的施行被认为应当以获得人民的衷心拥护为前提,让人民从内心接受《实业计划》并为之实现而共同努力。在谈到《实业计划》的实施步骤时,孙中山特意强调,除了各投资国的政府必须组织有序,还“必须设法得中国人民之信仰,使其热心匡助此举。”^{[1]XV} 他还以盛宣怀当年实行铁路国有的失败教训为例,告诫读者:不顾民意而一意孤行最终其计划必将遭遇人民的抵制,因此“吾人不可不重视民意也。”^{[1]XV} 拟定《实业计划》时的中国仍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之下,自鸦片战争以来各种不平等条约让中国人民对外国投资很难抱以信任,在民族感情方面就难以过关,所以孙中山对民意的重视不无道理。正因为如此,他突出强调与外国投资者签订的合同一定要“中外利益均沾”、“于两方最得宜”。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实业发展计划不仅要获得人民的信仰,而且还要令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实业发展的成果,这即是注重民生的表现。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甚至针对民生专门拟定了涉及“工业本部”的第五计划。所谓“工业本部”,就是指劳动者及其家人生活所依仗的各种物质资料。孙中山指出,推动生产生活资料的相关工业的发展,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多数人民一方面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又能以较为低廉的价格获得各类生活资料,而实业发展最终是为了“图全国民之福利”、为了“人民将一律享受近代文明之乐矣”。^{[1]283}《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部分,孙中山仍然坚持要“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而如前所述须“制造国家资本”。实业发展由国家经营的目的是确保“所得的利益大家共享,那么全国人民便得享资本的利,不致受资本的害,像外国现在情形一样。外国因为大资本是归私人所有,便受资本的害,大多数人民都是很痛苦。”^[5] 由此可见,整部《实业计划》从内容到手段都是服务于让“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这个根本目标。

再看今日的中国,与孙中山在实业发展计划中关注民意和民生相呼应的,无疑是贯穿在40年改革开放事业中的群众路线:关注民意即改革要依靠群众,关注民生即改革要为了群众。中国共产党向来坚持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主体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强调改革是人民群众的实业,改革的成败取决于改革自身能否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进入新时代,中国的改革已经身处深水区。面对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局面和难啃的硬骨头,人民群众的拥护

与支持更是改革能够迎难而上的根本动力。全面深化改革要想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就必须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说:“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要“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2]231} 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民生问题、公平正义问题。40年的市场化改革确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也确实在总体上提高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但收入差距的拉大以及诸如住房难、就医难、教育难、就业难等民生问题的凸显让一部分人民群众在是否继续推进改革的问题上产生了动摇,更让一部分学者以及公众媒体对孙中山百年前所说的“节制资本”的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18年,某演艺人员由于偷税漏税被罚款8亿的事件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而对此事件进行的诸多反思中最尖锐的莫过于从公平正义视角切入的拷问。应当看到,在那些收取天价片酬的演艺界人士背后呼风唤雨的推手其实就是资本。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所谓金融界人士吴小平在2018年9月引发了一场“民营经济退场论”风波。尽管主流媒体甚至国家领导人随后频繁表达对“两个毫不动摇”的坚持,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局限必然导致类似争论不会就此停息。对此,孙中山所拟《实业计划》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要将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同保障民生、维护公平正义联系起来,只有让前者真正做到为后者的实现而服务才能脚踏实地地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2]45}

4 坚持和平崛起

从实业计划的“自序”开始,孙中山就将自己的设想置于一战结束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字里行间表达着对世界和平的向往以及对中国通过实业发展应走和平崛起之路的坚定信念。在“自序”中,孙中山认为“各国人民久苦战争,朝闻和议,夕则懈志,立欲复战前原状,不独战地兵员陆续解散,而后路工厂亦同时休息。”^{[1]V} 这是说,各国人民承受着战争带来的痛苦,一旦战争结束就迫不及待地想重建家园、恢复往日和平宁静的生活;不仅前线士兵会陆续复原回乡,而且后方工厂也将停止生产军用物资。国际发展中国实业计划的实施在作者笔下也有化干戈为玉帛的意义:在物质生产层面,国际发展中国实业计划的实施将使各国的“战争机器……变成平和器具,以开发中国潜在地中之富”。“造巨炮之机器厂,可以改制蒸汽辗压,以治中国之道路;制装甲自动车之厂,可制货车以输送中国各地之生货。”^{[1]X} 在利

益关系层面,国际发展中国实业计划的实施将使各国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合作开发中国实业的过程中“可使人类博爱之情益加巩固,而国际同盟亦得借此巩固其基础。”^{[1]X V} 孙中山认为,类似一战这样的国际战争就是“有组织之大强盗行为”,凡有识之士对这样的战争都应深恶痛绝。究其根本,列强之间的冲突以及对中国的欺压无非是为了利益。日本在近三十年间频繁地发动或参与战争,孙中山认为原因就在于日本从战争中能够“获最丰之报酬”,于是将军国主义政策奉为“民族进取之利器。”但他从一战实际情况出发,确信日益攀升的经济成本将使通过战争所获得利益不及和平的商业投资丰厚。正是以此判断为前提,孙中山认为国际发展中国实业计划的实施将会通过有效在列强间促进合作、增进互信从而根绝爆发国际战争的动机,并为在列强包围下的中国赢得和平的发展环境。至于中国自身借助实业发展崛起过程中的道路选择问题,孙中山拒绝仿效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而是强调创建中华民国的初衷就是为了和平,因此自身所拟定的计划也应用于“以和平改造中国”。^{[1]281}

再看今日的中国,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也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了新征程:到 2035 年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 2050 年左右要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比于孙中山撰写《实业计划》时世界局势的动荡,今天虽然局部仍有战火但和平与发展却是主题,因此更值得关注的是日益强大的中国自身的和平崛起问题。必须要看到,伴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一方面在外部有西方国家和媒体炒作“中国威胁论”,从军事国防、生态环境、商业投资、网络安全、粮食生产与贸易等各个维度对中国国力的增强提出质疑;另一方面在内部有少数人萌生狭隘的民粹主义思想甚至极端主义思想,在因领土争议和历史问题而导致中日关系紧张、因部署萨德问题导致中韩关系紧张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当前的国际影响力与国际地位已与百年前不可相提并论,但是中国共产党仍旧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向世界承诺:“中国绝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2]59}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在全球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在持续推进亚投行和“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的过程中,中国不仅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步伐,更不断地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与互信,通过共享共赢的经贸往来真正让世界各国感受到中国和平崛起的善意与决心。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百年前受列强鱼肉的对象,而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新兴大国。也正是因为我国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越来越近,和平崛起的问题才变得愈发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中国一定要跳出“国强必霸”的历史周期律,这与百年前孙中山拒绝“以日本化中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不仅提出了借助国际资本发展中国实业的具体计划,而且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设定了若干基本原则:坚持对外开放,共享共赢;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与国有企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和平崛起。所谓的人类问题在工业革命以后归根结底就是通过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问题,上述原则共同构成了孙中山心目中解决人类问题的一套中国方案。这套方案中的基本原则在今天为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并继续成为当代“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智慧和方案”中的核心要素。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后,国家不断设立经济特区、开辟经济开放区、增设对外开放口岸,与其他国家持续建立合作关系,共享合作成果。1998 年到 2018 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由 26 854.1 亿元飞速增长为 305 008.1 亿元;对外经济合作由 117.73 亿元增长为 2418.00 亿元。

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与国有企业”的脚步从未停止,党和国家不断深化改革,增强中央企业的发展活力、提升发展质量与效益。从近 20 年的工业企业的数据变化中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从 1998 年至 2018 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计由 74 916.3 亿元上涨至 439 908.8 亿元,利润总额由 525.1 亿元增长至 18 583.1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由 108 821.9 亿元上涨至 1 134 382.2,利润总额由 1458.1 增长为 66 351.4。

中国实业发展的同时,民意与民生的注重也并驾齐驱。1998 年人均可支配性收入为 5425.05 元,2018 年人均可支配性收入增长为 28 228.00 元。对于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文化和体育等方面的投入持续增长,真正做到了实业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随着中国实业坚持做强做优做大以促进经济的

稳步增长及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直倡导“和平、发展、合作”的主流,截至 2019 年 9 月 27 日,一共与 180 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合作共赢,共享发展成果,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同时,积极发挥着促进和平发展的作用。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对孙中山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设定的若干基本原则的继承与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内容中更可以体现出党对上述孙中山提出的若干基本原则的继承与发展,是党中央立足于新时代绘制的雄伟蓝图。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事实证明,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大

前提,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设想的中国方案才有可能得到有效贯彻。

[参 考 文 献]

[1] 孙中山.实业计划[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4.

[3] 马骏.中央要做强做优的是国有资本 不是国有企业[EB/OL].(2019-01-12)[2019-09-02]. <http://money.163.com/19/0112/19/E5BJ4N0E002580S6.html>.

[4] 宋方敏.坚持“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和“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统一[J].红旗文稿,2018(2):21.

[5] 孙中山.三民主义[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191.

Chinese Solutions Contributed to Solving Human Problems

—Rereading Sun Yat-sen’s Industrial Plan

CHANG Hengyue, HAN Dong

(School of Marxism, Hubei Univ. of Tech., Wuhan 430068, China)

Abstract: Sun Yat-sen hopes that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dustrial Plan, he can accelerate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and contribute Chinese solutions to human problems. From the Industrial Plan, four basic principles of Sun Yat-sen 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a can be extracted. We will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for win-win results; continue to strengthen, optimize and expand state-owned capital and enterprises; adhere to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and insist on peaceful rise. These four basic principles have been inherited by Chinese communists today, and facts have proved that only on the premise of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these principles be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in practice.

Keywords: share; state-owned capital; people; peace

[责任编辑:裴 琴]